

蓝翎 著



走出误区

学人文库

新华出版社

唯取一瓢 草台悲风

天问问天 颖悟红尘

攀龙附凤 恭叩沈门

风云难测 默默动情



学人文库

走出误区

蓝翎 著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出误区/蓝翎 著. -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11

(学人文库)

ISBN 7-5011-4256-4

I. 走… II. 蓝…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 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1728 号

学人文库 走出误区 蓝翎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门西大街 57 号 邮编: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字数 195000
1999 年 1 月第一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7-5011-4256-4/Z·545 定价:14.80 元

自序

“误区”二字是近些年才经常出现的新词，一般辞书尚未收入，不像“误会”、“误解”之类的习惯用语，从口头到书面都约定俗成了。这个词文绉绉，也含蓄，表面所指不具体明确，所以非常适用于那种不宜明指的地方。读者结合上下文一看便知，心领神会，那种专爱挑字眼儿以图诬陷的人，似乎也不好强行索隐，使用起来较为方便安全。

按照我的理解，说白了，“误区”所指就是走错了地方，进错了门儿。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只要误入歧途，跌进陷阱，坠落深渊，都是进了误区，肯定吃苦受折磨甚至赔上性命，除此而外，绝无好处可言。如果是自己主动造成的，那有传统的定性说法，或叫“自食其果”，或曰“咎由自取”，更甚的是“自做孽不可活”，比天做孽还可恨。及至真的“天做孽”了，又谁敢直指其咎！按圣人的指示，讳还来不及呢，哪还敢妄言妄动。不能不佩服“误区”的创用者，既善于讳，又能不失时机地稳妥地把问题摆出来。到了今天，这个词已失去了神秘性和含蓄性，连一般消费者都时时有走进误区的可能，如“购物误区”、“投资误区”、“消费误区”等等，只要提个醒儿，免得上当受骗，用不着过多地讲什么理论问题了。

如果进一步思索，从人的认识和实践看，出现误区是经常发生的，也的确有可研究的理论。

从人类的发展看，人是被动地由自然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且不说我们至今仍然认识极有限的(有限耶?无限耶?)整个宇宙,就只限于地球来说,自然界的历史很长很长,人类的历史很短很短。人类由被动地适应自然,逐渐发展到能主动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但人类的认识在任何时候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当还看不到在利用自然的同时,由于把握失度,于是又造成了对自然的破坏,从而反过来又造成对人类的惩罚。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人类才发现曾经不知不觉地走入了误区,才提出了保护环境的生存长策,也就是要有意识地走出误区。在误区里觉醒并力争尽快地走出,是智慧的发展和进步,陷入误区而又不觉悟,甚至还觉得满不错,洋洋自得,那已是一种可恶的悲哀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历史的重要关头出来敲警世钟的先行者,是永远值得钦敬的。

把范围缩小一点。当一个国家或民族处于朝气蓬勃兴旺发达的时期,肯定是没有陷入重大误区,或者是从重大误区中勇敢走出的结果。人们常说,历史的道路不是笔直的,总有迂回或曲折,这就意味着曾有过陷入误区的迷途,否则,岂不是阳关大道你不走,为何偏爱独木桥,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冒傻气。

再把范围缩小一点。一个人的认识或行动之陷入误区,大概不外几种情况。一种是被人诱导或陷入圈套,如林冲之误入白虎堂,想得天真,上当受骗,及至发觉,悔之已晚。一种是自作聪明,损人利己,积恶深重,终难逃脱惩罚,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如《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之流。一种是盲目迷信,愚昧无知,违背科学,自食苦果。一种是缺乏独立思考,随大溜,人家往东他往东,人家往西他往西,以为如此最安全,到头来仍未避免翻了船。人间众生相甚多,个别人的入误区,对整个社会来说,影响甚小,不足为虑。所可畏者,是社会上层领导者认识和决策的失误,致使全社会陷入认识和行动的误区,造成国家和民族的大灾大难。具体来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例,把国民经济引向了崩溃的边缘,还不是最大的误区吗!历经十年,局面方得扭

转,从错误的道路上拉回来,太不容易了。但是,要消除“文革”的思想认识之影响,却不是十年八年能彻底见效的,说的严重些,这是几代人的任务,而且要自觉地不断地认真努力才行,如有松懈,说不定在某个方面又会冒出来。因为“文革”的发生不是个别偶然事件,有其前因后果,或者说是长期搞政治运动的总爆发,最后结果;所以“文革”结束后要“拨乱反正”,要“解放思想”,正是看到了消除影响的艰巨性。其实,走出误区也就是解放思想,至少是一个重要的认识范围的方面。不理解甚至反对解放思想的“凡是派”,正是对误区的流连者。

举具体学术事例来说,“文革”结束了20年,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学术讨论会才明确批评了这个学术研究中的三个“误区”,可见发觉误区并不容易,走出误区更不容易。已习惯成自然了,突然说“今是而昨非”,能立即转过来吗?可是不转过来又有什么好的出路呢?史学界走在了前面,而曾深受影响写中国农民战争题材的文学创作界,又是如何对待这一问题的呢?有感于此,我才借这一学术讨论会的报道,写了篇短文《走出误区》。我并非专讲别人如何如何,“文革”以后,我也是一点一点地觉悟到“今是而昨非”的。过去学了很多被认为非常正确的东西,其实是非常不正确的。总结我近二十余年所写的文字,都只不过是表现“走出误区”的心迹而已。至于是否走出了旧误区,是否又不自觉地陷入新误区,我也是没有确切把握的。我并不欣赏“误区”这个词,但“走出误区”似能更贴切表达出我的心迹和文迹,所以使用作这一本并非全新文字的集子的名字。贤明的读者如能指出我仍在误区里,当以师礼相拜也。

蓝 翎

1998年7月10日

目 录

半截春联	(1)
若有来世	(3)
走出误区	(6)
思无邪	(9)
浮动秤砣	
——读报随感	(10)
文不对题	(13)
乱套套话	(16)
隔布袋买猫	(18)
热潘冷武	
——水浒传里外	(21)
唯取一瓢	(25)
把槌敲准	(26)
体育即玩	(28)
无趣乏味	(31)
神往神游	(33)
穷途末路	(36)
空缺待补	(38)
权当消夏	(41)
淡然置之	(43)

师倒尊严	(45)
攀龙附凤	(48)
返老还童	(51)
恍然大悟	(52)
寄语《辣椒》	(54)
横得出奇	(57)
除夕兔子	(59)
以史为鉴	(60)
且看包袱如何抖	(61)
五元“特别奖”	(62)
壶焖蟹将	(63)
想起那条“街”	(68)
海塘永强	(70)
草台悲风	
——乡风逝水录	(74)
仁者长寿	(80)
恭叩沈门	(85)
玩中有史	(88)
颖悟红尘	
——读《邵燕祥文抄》	(91)
体验“体验”	
——读《世纪预言》随想	(92)
闲人聊书	(97)
迷而不迷	
——读《吴小如戏曲文录》断想	(100)
格局初定 风格有待	

——读“河之洲”副刊印象	(105)
沉埋的“东珠”重放异彩	
——观电视剧《努尔哈赤》札记	(110)
摆正文学评论的位置	
——在《文艺报》座谈会上的发言	(118)
循序渐进 不断积累	(121)
民族性、北京味及其他	(125)
天问问天	
——在文学创作西峡笔会上的发言	(134)
“索引”的“索隐”	(136)
谁来打炮?	(139)
“龙子”云何?	(141)
“老爷”说的准没错	(143)
翻译家“破门而出”	(145)
独立思考的智慧	(147)
相信·相和·相争	(149)
“闷棍”	(151)
“打啥有啥”	(153)
“锣鼓”声外	(155)
“杀风景”的古迹	(157)
从“差不多先生”到“上”人	(159)
“好观众”难易论	(163)
毒草开奇花	(166)
万金也难计	(169)
可怕而又可爱的考验	(172)
悲剧“天问”	(177)
读“朱批”	(181)

既抚吴钩 又弄匕首	(187)
猪不是人	(191)
小专栏大手笔	(194)
只可“顺撑”	(197)
风云难测	(200)
默默动情	(203)
《中国杂文大观(3)·序言》	(206)
《中国杂文大观(3)·后记》	(240)
后 记	(243)

半截春联

老年人的思维定向常同幼儿相反,比如老年人爱说小时候如何如何,幼儿则爱说长大了怎样怎样。眼下春节即到,我的第三代天天掰着指头盼,我却忽然想起自己像他们这样年龄的时候。

想起了什么呢?一副春联。准确点说,应是半截对联,不过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过了几十年才了解到这不知道的地方就大有学问。

我在农村上小学时,都是春季始业,即春节后开学招新生。我刚开始在外村读二年级,炮声一响,日本鬼子打进来,学校立即停办,我就无学可上了。本村有教过小学的老师,不忍看着孩子们失学,便找了间闲房,趁农闲时把几个小孩子拢在一起,凑合着认几个字。

凑合了几个月就到新年。那时乡下还不兴用公历,仍是叫“民国二十八年”,即公元1939年。新年家家贴春联。不识字的也知道自家门上贴的怎么念,因为买春联或请人写时,已让人给念了,默记在心里。不过这都是些常用的,年年有,唯独那间学屋门上的一副,是平常没有见过的。上联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下联是“风声雨声读书声”。这是教课老师写的,开学后教给学生念。学生跟着念,不懂说的啥意思。

我为什么偏偏记住那一年是“民国二十八年”?因为以后又有了新叫法。此前,日本鬼子和汉奸队占领县城圈里外,离城稍远点的是“国民政府”的地方政权和“国军”游击队,再远点的就是弄不清姓蒋还是姓汪的诸多胡传魁式的“司令”。处在这种环境里的老百姓,家门上

贴什么“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春联，是可以理解为“民不聊生”的。学屋门上的那一副就更有深意了，只有“事”和“声”，如何理解，全在不言中。当年秋后，远离县城的乡下开来一支新的队伍叫“八路军”，第二年春节就有敢贴“坚持抗战，反对投降”新对联的，吃公粮的干部也不再称“民国”多少年，而说1940年，听着新鲜。

十多年后，我也蹭进了知识分子的行列，读了点古书，才了解到那副对联的全貌。那是明朝末期东林党人顾宪成题东林书院的，全文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东林党人，多为有骨气的知识分子，评议当时腐败昏暗的朝政，反对阉宦专权。那副对联的基本精神就是启发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天下大事，此后广为流传，直至传到偏僻的农村。我所见的学屋门上的那副，不仅两联各少写了“声声入耳”和“事事关心”八个关键性的字，而且来了个上下联次序颠倒。这是深有用心的。我曾听到过写这对联的同另一位穷教书的说，声声入耳的是枪炮声，谁关心老百姓，没法说。因为尚未看到希望而又放心不下，还怕惹祸，所以只写了半截对联，让你琢磨去。

本来是一副很好的对联，竟然落到只能写半截的局面，除了当政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外，是否因作为国民一分子的个人忘记那八个字也多少有点关系呢？那八个字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也是相通的。而后者，这几年已变成讽刺的对象，谓之不懂“实惠”云云。这种讽刺别人的人的心态，不正是在一定条件下造成半截对联的思想基础吗？

一副对联，三百余年，之所以能久传不衰，就因为它体现了个人的历史责任感，是民族魂的一种表现，是民族的脊梁。每到春节，是否一定要写它，并不重要，如果能常年牢牢地挂在众多人的心上，谁又敢说这个国家和民族是没有信心没有希望的呢！

1997.1.30

若有来世

记得去年下半年,《今晚报》发表了卞毓方君的散文《假如重新选择……》。一两天后,偶遇于路,卞君说,那篇文章里提到我。当时我身体正感不适,没有认真去读。后有亲友几次电话相告,说一家刊物摘载了此事。仿佛成了什么新闻似的,虽然身体仍不适,也不得不将卞君的大作重读几遍,心里甚为不安,的确感到有必须申说之处。

正如题目所标示的,卞君选择了“假如”的特殊角度,向二十多位人士提出问题,请求回答。“假如”的前提指的是来世,提问者和被问者都是不相信有什么来世的,只不过是在类似游戏的形式下谈现世的人生罢了。

对于这个问题,被问者有的不回答,有的回答是“哈哈哈哈哈”,有的则是明确清楚地回答。相比之下,只有我的“回答”既生硬又无逻辑性:“这个问题我如此回答你:我最初的愿望是学英语,我的后辈都是工程技术人员。”何所云哉?简直让人摸不着头脑!语气也不礼貌嘛。

我在新闻界工作过几十年,直至离职休养,从来没有正式接受过别人的采访,也没有书面回答过什么供公开发表的提问。我的工作任务是宣传别人,自己干嘛趁便搭车。再说自己的文章写得

很一般，如果老端着架子发表谈话，不是太无自知之明吗？那么，卞君写的那段话又是如何来的呢？待我从头说来，尽可能把话说明白。

在我不担任公职以后的一个时期内，原来的办公室还保留着，以便读书写作。卞毓方君调来后，办公室和我的错对门，偶或过来聊几句。我为了避嫌，一概不谈有关本单位当前的工作，以免被人误解为干扰。有一次，卞君提出了前边说到的那个问题，问我有何看法，并没有说要公开发表，否则的话，我既不会回答，谈话也不会继续下去。

我同卞君谈个人的经历时，强调的是偶然性和组织的决定性，没有什么个人可选择的余地。我小时候听说本村在外地的一户人家，同胞三人都是工程师，而且出国留过学，因此产生了盲目的幻想，说长大后也要当工程师。究竟工程师是干啥的，则毫无所知。上了中学，才知道要想将来学工，必先学好英语和数理化，从来也没有想到要学文。中学未念完，时代大变样，凭热情参加革命工作，放弃了当工程师的梦，一切无条件服从组织上的安排。组织上让学马列主义就认真学；组织上让改学文学就坚决改；学英语犯嫌疑，学俄语最时髦。学习结束，组织上分配当教师就去当，调动当编辑就踏踏实实编报。组织上要搞政治运动了，就争取当积极分子，有好的表现。组织上要我当“右派”了，不愿当也得当，“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你别无选择”。时过二十余年，组织上说当年“扩大”错了，要改正过来，我高高兴兴又回来，毫不留恋。年尚五十有八，组织上说虽然离退休年龄还不到，先卸下担子去搞写作吧。随后组织上没有明说，不知不觉就作为离职休养人员交老干部局管理了。我不担任公职了，我的子女却都当上了高级工程师，第二代圆了老一代早已消失了的工程师之梦。这大概也是偶然，非有意选择而得也。几十年匆匆而过，我何曾有过人生选择的觉

我同卞君谈话的主要意思就是这些,完全属个人私事,没有公开发表的必要。他既然概括成那三两句公布了,为了减少读者可能产生的疑惑,我不得不申说几句,否则好像我在故弄玄虚似的。我信服古人说的“死后方知万事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根本不相信有来世。如果按照卞君的戏问真有什么来世以供重新选择的话,那么,我要选择一条可任凭选择的人生之路,奉献大于索取,生也默默,去也默默,像世代代不见闻于世的普通劳动者那样,不抢镜头或硬往新闻里挤。后代子孙不知道自己没关系,如果遗羞于后代,即便来世再“风光”也没劲!

1997.4.9

走出误区

今年第二期《文史哲》杂志,发表了一则《中国农民战争史第九次学术讨论会综述》。会议是在去年10月间举行的,至今已过半年,但所讨论的问题,仍然令人感到新鲜,很值得搞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者或研究者思索。

据报道,会议对建国后四十多年来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进行了较为广泛的反思,在肯定“硕果累累、成绩斐然”的前提下,也总结出“四个严重失实之处”,批评了三个研究“误区”。所谓四个失实之处,即对中国古代社会基本矛盾的概括有误;把历代起义者描绘成现代农民革命英雄的光辉形象;随意扩大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范围;史料运用上的不良作风。所谓三个误区,即“唯成分论”的倾向;将农民起义与全民起义相混淆;不承认历史上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暂时合作的历史事实。我想,参加会议的学者谈论这些问题时,肯定是旁征博引、滔滔不绝,综述者不过“撮其要”,到了我的转述,只剩下“话一句耳”。好在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有兴趣者自会去认真阅读的。那么,我从这次阅读中想到了什么呢?

“农民起义”是革命史学的特定概念,指的是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有组织地对地主阶级及其政权统治的反抗。如果被镇压下去,是谓失败,如果达到了“取而代之”的结局,那必是新的改朝换

代。然万变不离其宗,仍然是封建社会。在这种形势下,又酝酿着新的农民起义。封建不除,农民起义不止,因而形成历史的怪圈,螺旋前进,循环不已,其历史的局限性在这里,进步性也正在这里。只有到了新的革命时代,才能打破这个历史的怪圈。所谓四个失实和三个误区,归结到一点,或是对这一怪圈的曲意掩饰,或是在幻觉中提前打破了这一怪圈,为了迎合某种需要,编造出虚幻的历史,不仅失去了史学应有的本色,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文艺领域里农民起义题材的创作和研究。

对农民起义的历史研究,在建国前就有了相当的成就和影响,如关于太平天国的研究,关于明末李自成起义的研究,特别是郭沫若写的李自成起义为何失败的《甲申三百年祭》,成了革命者必读的文章,以便从中汲取教训,巩固将要取得的新政权。如果说在此以前,文学领域里已有过零星的写农民起义的小说和戏剧,那么,在此以后所出现的有关农民起义的小说和戏剧,就是有意识地配合这种历史要求的产物,起了积极的影响。建国以后,关于农民起义的历史研究形成了一种新的学科,而且“与其他学科不同,这一学科从一开始就承担着意识形态功能。成为中国史研究领域里政治敏感性最强的学科”。尽管对具体的问题可能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这种总趋势和研究框架则是不容超越的。

不可否认,建国后文艺创作领域里大量反映农民起义题材的作品的出现,以及随之而产生的与之相关的文艺评论和研究,都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农民起义史研究的影响。别的暂不说,就以我所阅读过的不算少的小说而言,要从中挑出类似四个失实或三个误区式的大小毛病,是不必费大力气的。有的书不正是把农民起义者“描绘成现代农民革命英雄的光辉形象”吗?李自成的队伍很像他家乡三百年后才会有的八路军,可信吗?有的书不正是按“唯成分论”来图解人物性格吗?农民起义队伍的领导层一有严重的矛盾冲突甚至发生内讧,就归结为是混进来的地主分子